

# 深入学习“四史” 牢记初心使命

□ 李 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学习,强调“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深入学习“四史”,有助于我们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真正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担责。

## 深入学习“四史” 坚定理想信念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探索到创新的发展历程。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杨匏安、李汉俊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毛泽东曾回忆,是《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使他“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党的历史上镌刻着无数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和英雄人物。1920年初,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老宅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误将墨汁当红糖吃下去。共产党员张人亚用衣冠冢保存党早期的文献资料。“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方志敏烈士把共产主义视为永不放弃的信仰。罗荣臻回忆,红军打仗,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他们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绝对信仰,前仆后继,慷慨捐躯,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开辟出一个崭新天地。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我们

党有448万余名党员,而此前为革命牺牲的、可以查到姓名的烈士就达370多万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理想信念之光,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从带领全村人民集体奔小康的华西带头人吴仁宝,到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孔繁森;从司法改革燃灯者邹碧华,到扑下身子苦干实干,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的廖俊波;从秉持航空报国志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践行人生伟大宗旨的罗阳,到放弃百万年薪,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韦慧晓;从绿了荒山而白了头发,老骥伏枥仍意气风发的杨善洲,到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精彩人生的老英雄张富清……无数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彰显着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不顾身、无私奉献。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深入学习“四史”,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不同时期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奋斗牺牲和历史传承,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在新时代把坚定理想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践行初心使命。

## 深入学习“四史” 坚守人民立场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坚守。

坚守人民立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民主体地位。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开辟出一个崭新天地。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我们

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坚守人民立场,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同党以往任何运动作了科学区分,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944年,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思想,明确向全党提出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党以及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党以及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强调:“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能不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必须解决好的一个时代课题。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习“四史”,不仅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历程、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也为我们深刻理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更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

发展思想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 深入学习“四史” 践行使命担当

从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历史使命与宏伟目标。深入学习“四史”,打通历史与现实来观察,中国已经成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1949年3月,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进京赶考”的号召,并且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工业化和全方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追求。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年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毛泽东结合新中国的实际情况,设想了新中国工业化的时间跨度和具体任务要求。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1987年,邓小平又完整概括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经过数十年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业一以贯之、接续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发展,总揽全局,以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精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实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我们既需要继承前人不懈奋斗的精神气,也需要从中外历史中汲取智慧与经验。学习“四史”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赶考”的历史经验,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和实现路径,助力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

# 党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942

淮河发源于河南的桐柏山,全长约1000公里,是我国重要的南北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界线。淮河作为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之一,曾经独流入海。自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黄河夺淮,淮河水海道不断受到侵蚀,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由大清河入海,结束了黄河夺淮的历史,“导淮”呼声与各种导淮方案随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淮河治理,淮河成为我国从水利工程上进行全面治理的第一条河流,经多年不懈努力,淮河流域逐步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综观我国治理淮河的历史过程,呈现出从“导淮”到“治淮”的演变趋势,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对我们更好地治理淮河,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导淮”主张由江苏淮安士绅丁显于1866年(清同治五年)提出。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也曾对“导淮”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淮河灾害频发,根源在于:“入海路断,入江路淤,水一大至,漫溢四出”(《请速治淮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十)。治本之策即导淮入海,畅通淮河入海通道,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淮河水灾,也有助于减轻汛期长江的防洪压力。他不仅重视对导淮人才的培养,设立专门培养导淮人才的学校,还运用科学手段对淮河进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江淮水利局施工作业计划书》,在综合分析防汛、灌溉、航运的基础上,提出了淮水入江、入海的具体办法。从这一时期提出的各种方案来看,尽管在入海通道的选择、入海水量的分布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导淮入海、打通淮河入海通道,基本成为解决淮河洪涝灾害的共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近代“导淮”呼声虽高,“导淮”却未能真正付诸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淮河治理高度重视,开始实现由“导淮”向“治淮”的转变。1950年,毛泽东作了根治淮河的多次批示,他在1950年7月20日指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致明年水患。”9月,又在批示中强调:“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55~3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三个“早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淮河两岸人民安危的牵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方针》,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具体措施是:上游修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兼顾,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整理河槽,承载拦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鉴于洪泽湖内涝严重,该决定还强调:“同时注意防止,并列为今冬明春施工重点之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26~429页)从内容来看,《关于治理淮河的方针》突出对淮河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成立高规格的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主任、副主任、委员人选由政务院任命,分设河南、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另设上、中、下游三工程局,分别参加各指挥部为其组成部分。二是将淮河作为一个整体,一体谋划,上、中、下游同时推进。工程实施方面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相互配合。三是开辟入海通道,提高防洪能力,同时重视建设湖泊洼地的蓄洪工程。此后,统一规划、蓄泄兼顾、综合治理一直成为治理淮河的指导思想。

1981年《国务院治淮会议纪要》以蓄泄兼顾的治淮方针为原则,制定了治淮十年规划。对于防洪问题,强调“要开辟直接入海的水道,才能根本解决洪水出路”。与此前相比,会议纪要总结了新中国治淮实践和成就,在治淮思路视野更加开阔,强调综合治理,发挥整体效益:一是重视水土保持,强调“山区面积约占全流域六分之一……应广植植树育草,进行水土保持,充分利用山区多种生物资源”,明确“不准毁林开荒,陡坡种植,破坏水土保持;不准破坏水利工程及其防护林木”。二是强调重视农业灌溉,发展多种经营,“丘陵区面积也约占全流域六分之一,主要威胁是干旱,需要蓄、引、提相结合,解决灌溉问题……并充分利用水利工程的优点,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

济”(得邑)

## 从“导淮”到“治淮”——我国治理淮河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

□ 吴春梅

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一年10月,国务院召开治淮工作会议,要求将加快淮河治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建设的重点任务,早日实现淮河长治久安。12月,水利部印发《加快治淮工程建设规划(2003~2007)》。除继续坚持“蓄泄兼筹”的方针外,还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此后,治淮重点工程全面提速。

2018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淮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以绿色发展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调环境保护、生态修复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造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经济带,将对淮河流域的综合治理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高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致力根治淮河水患,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人与水和谐共处,再到《规划》的提出,随着对淮河治理认识的不断深化,治淮实践也不断向纵深推进。

对淮河的治理历程表明,除害兴利,综合治理是关键。一是将淮河水系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干流的上、中、下游要统筹谋划,同时也要重视对支流的疏浚。二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应整体推进。三是除害与兴利相结合。淮河位于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一方面降水集中,容易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却又季节性缺水严重,导致淮河流域农业灌溉受影响。张謇曾指出这种现象,“非横流千里,即赤地千里”(《代江督拟导淮公司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十)。此外,淮河水系发达,构建铁路、水路联通的立体交通体系,充分发挥其航运功能,也是兴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未来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统筹防洪、生产、航运需要,科学做好蓄、泄兼顾,不仅除害,而且兴利。

畅通下游出海是重点。历史上的淮河与长江、黄河一样,有独立的出海口。黄河夺淮使淮河开始与黄河共用入海水道,1851年(清咸丰元年)淮河被迫南下入长江,并最终失去独立的入海通道。尾闾不畅导致淮河流域灾害频发,也影响了长江下游的安全和发展。这也是近代“导淮”成为各种方案共识的原因。1998年淮河入海水道开挖,2003年入海水道滨海排水入海通道,从此次淮河有独立的排水入海通道,防洪、灌溉能力得到提升。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的实施,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防洪、灌溉能力,也有助于通江达海,进一步拓展航运功能,促进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组织领导,共同治理是保障。淮河贯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协调推进、共建共享是治理淮河的保证。虽然张謇指出“划界为治,两省不利”(《江准水利计划第三次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十二),呼吁淮河流域各省通力合作,但在当时根本无法实施。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成立了直属政务院的高规格治淮委员会,成立了国务院治淮领导小组,重视发挥流域机构统一管理的职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流域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确定的治理方案及实施计划进度,分工负责,抓紧实施。要上中下游统一治理,顾大局,讲整体,局部服从整体,团结治水”。治淮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决定》对行蓄洪区居民的生活高度重视,指出“要严格控制行洪、蓄洪区人口,对经常行洪的行洪区居民,要作为一个整体,一体谋划,上、中、下游同时推进。工程实施方面轻重缓急,有序推进,相互配合。三是开辟入海通道,提高防洪能力,同时重视建设湖泊洼地的蓄洪工程。此后,统一规划、蓄泄兼顾、综合治理一直成为治理淮河的指导思想。

1981年《国务院治淮会议纪要》以蓄泄兼顾的治淮方针为原则,制定了治淮十年规划。对于防洪问题,强调“要开辟直接入海的水道,才能根本解决洪水出路”。与此前相比,会议纪要总结了新中国治淮实践和成就,在治淮思路视野更加开阔,强调综合治理,发挥整体效益:一是重视水土保持,强调“山区面积约占全流域六分之一……应广植植树育草,进行水土保持,充分利用山区多种生物资源”,明确“不准毁林开荒,陡坡种植,破坏水土保持;不准破坏水利工程及其防护林木”。二是强调重视农业灌溉,发展多种经营,“丘陵区面积也约占全流域六分之一,主要威胁是干旱,需要蓄、引、提相结合,解决灌溉问题……并充分利用水利工程的优点,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



1950年冬淮河治理工地。

济”(得邑)

济”(得邑)

济”(得邑)

济”(得邑)

济”(得邑)

济”(得邑)

济”(得邑)

济”(得邑)

## 信息与动态

### 专家学者研讨

###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规律。日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京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当代中国研究京师论坛——2020年年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6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1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何毅毅、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皓等代表

各方致辞。何毅毅从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明理等角度指出,学习和研究“四史”具有极不寻常的重大意义,可以使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角度更好地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新中国要坚持唯物史观,从长时段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被细小所迷惑,不被碎片所遮蔽,坚持三点原则:第一,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第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主线;第三,应当着力研究改革开放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来的历史。董奇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在历史学科建设方面具有雄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传统,著名历史学家王桧林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科学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北师大现代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师大历史学科要进一步突出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推动历史学科的创

新、融合与发展。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原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朱汉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李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张太原等分别围绕《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读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几点体会》《从职工保险到全民保险:当代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考察》《以五年规划引领发展是我国的制度特色和制度优势》《理想追求和历史变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建及终止》等主题作了大会报告。大家认为,推动“四史”学习,要抓住重点,关于中国共产党史的学习要突出革命英雄的主题,新中国史的学习要突出复兴的主题,改革开放史的学习要突出创新的主题,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要突出信仰的主题。在“四史”学习中,应以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为主体脉络,深入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经验,是学习“四史”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本次论坛设立“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对外关系”“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女性”、博士生专场等分论坛及圆桌讨论等环节。大家认为,当代史档案资料丰富,与现实联系密切,容易激发学者的研究热情,研究成果也容易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关怀,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同时,当代史研究也有相当的难度,需要强烈的现实关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方法自觉,也需要清醒的历史理性,需要抓住重大历史转折点、关键点和标志性事件,并努力将历史与现实高水平地结合起来,推动历史研究有效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得邑)

济”(得邑)